

● XINWEN CAIFANG SUOTAN

新聞 採訪 瑣談

李 音

●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新闻采访琐谈

李音著

12.18.60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高品瑚

封面设计 沈天呈

GT212.1
LY

130頁

451186-70

新闻采访琐谈

李音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插页 字数 98000

1989 年 12 月第 1 版 198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515—497—X/G · 93

定价:2.00 元

目 录

人咬狗不是新闻.....	1
从“杨妹不食”想起的.....	3
“退稿状元”的教训.....	5
记者——社会活动家.....	7
社会活动家的“显微镜”.....	10
两根标尺.....	12
不宜报道的好人好事.....	14
“蜻蜓”因何泛泛飞.....	17
“一次性采访”.....	19
“备忘录”不可少.....	21
不厌其烦的“访事”.....	23
记者采访也要“进入角色”.....	25
一次失败的采访.....	27
话不投机也要听.....	29
平面“资料库”.....	31
废品不废.....	33
无心插柳柳成荫.....	35
有个“根据地”好.....	37
广结“善缘”好处多.....	39
送上门来的报道线索.....	41
耳闻眼见大不同.....	43
不要强人所难.....	45

不是“无冕之王”	47
不受欢迎的“钦差大臣”	49
“客里空”为何“阴魂不散”	51
妙笔不能如此“生花”	53
艺术加工不能夸大事实	55
想当然闹出的笑话	58
戏剧性的“穿靴戴帽”	60
一字之差铸大错	62
引以为戒的“独家新闻”	64
鸡鸭事件的教训	66
认清庐山真面目	68
不可忽视的“小异”	70
新的相对性	72
“新瓶旧酒”与“旧瓶新酒”	74
“大题小做”与“小题大作”	76
纵深发掘 多方表现	78
对比是个好办法	81
重视报道的连续性	83
画龙还须点好睛	86
请教群众中的“语言大师”	88
借助知识添新意	91
采摘绿叶扶红花	93
淡妆浓抹须相宜	96
写出寓意深刻的结尾	98
指导性不等于业务性	103
寓指导性与生活情趣之中	105

“形象数字”.....	111
抓问题与抓典型.....	113
分量不在长或短.....	115
探讨问题的好形式.....	117
批评稿件的形式与效果.....	119
切忌好为人师.....	122
多形式与多面手.....	124
既是“专家”又是“杂家”.....	126
后 记.....	129

人咬狗不是新闻

什么是新闻？这是从事新闻写作的同志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可是，多少年来，这个问题在新闻界却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说，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情。这个概念的含义，似乎太广泛了。事实上，每个地方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都会出现一些原来没有的新事物，是否都可称之为新闻、都值得在报纸或电台上报道呢？显然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无论报纸版面有多大，都不可能，也不必容纳这么多的东西。也有人强调一个“奇”字，认为新闻是最近发生的新奇的事情。资产阶级的新闻学家甚至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就成为是新闻了。这种说法更是荒唐的。记者的任务绝对不是猎奇。当然，有些异乎寻常的奇事，如果确属客观存在的真实情况，不是不可以报道的。例如，某家的母鸡生了一只特大的鸡旦；某一头母鹿长出了茸角，一位妇女生了三连体的婴儿等等，这类事情可以告诉广大的读者，以丰富人们的社会知识，而且还有提供科学界进行研究的价值。但是，这类事情毕竟不是记者所要攫取的主要报道题材，也不能在报纸上占据很大的篇幅。

新闻事业是社会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新闻记者应该通过新闻报道为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作出贡献。同时，记者面对新发生的许多事情，首先要考虑有否广泛传播的价值。凡是影响较大，能够促进社会进步、有利于国家人民的新的信息、新动向，工作中的新成就、新经验；以及先进人物先进的思想、风格，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景象，这些都是应该攫取的报道题材。

这还只是一个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但新闻报道的内容，也

并不仅仅限于好人好事,另一方面,一些有害于社会事业和公众生活的不良现象,阻碍社会前进的绊脚石,也是作为社会活动家的记者所不能忽视的。记者应该以高度的责任感,通过调查研究,弄清出现这类现象的来龙去脉、形成的原因和谁是责任者,然后写成报道予以揭露批评。

新闻是否一定要新近发生的事情呢?这也曾是新闻界争论过的问题。诚然,顾名思义,新闻不是旧闻,更不是历史,新闻报道应该有强烈的时效性,无论多么有价值的报道题材,一旦成为明日黄花,已为人所共知,当然就没有报道的必要了。原则上说,新闻应该是新近发生的事。从事情发生与报道刊出,时间距离越短越好。但是,也并不能一概而论。在特殊情况下,有些很有报道价值的事情,虽然不是新近发生的,只要还不为广大读者所知晓,同样也是应该报道的。例如,公安部门破获了一桩反革命案件,在侦察期间,由于必须严格保密,不能够报道,等到侦察清楚,即使时间过去较久了,而人们还并无所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公诸于世,对广大读者来说,仍然不失为“新闻”的。又如,“四人帮”一伙对张志新烈士令人发指的迫害情况,在“四人帮”掌权的时候,他们封锁得极为严密,记者无从得知。即使略有所闻,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报纸是不可能报道的。“四人帮”一伙被打倒后,他们这种灭绝人性的暴行,为我们知道了,难道能够因为不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就不进行揭露了吗?事实上,这件事情报道出来,对广大读者来说,都是一桩特大的新闻。美国著名记者威廉·夏伊勒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这部巨著,以丰富有力的事实材料,揭露了纳粹希特勒一伙的滔天罪行,它是一部历史,同时不又是震惊世界的新闻吗?

从“杨妹不食”想起的

新中国诞生之前，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曾经报道过所谓“杨妹七年不食”的奇闻。说是重庆有个姓杨的姑娘，已经七年不吃任何东西了，而健康一如常人。这则消息登出以后，轰动一时，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注意，有些科学家和医务人员还专门对她进行了观察研究。无独有偶，时隔不久，“十里洋场”的上海，又发现了一个“上海杨妹”，说是已九年不食人间烟火，同样也有科学家和医生把她收进了观察室。

假的终究是假的。经过一段时间，骗局终被拆穿了。重庆杨妹不吃饭，但有人发现她偷吃饼干；上海杨妹不仅偷吃面包、巧克力，还有医生为她注射葡萄糖。

当时，许多报纸的记者，都卷进了这个奇闻的报道漩涡，有的报纸连篇累牍，大肆渲染。采写这些报道的记者，确实花了精力，动了脑筋，写得绘声绘色，神乎其神。当然，卷进这一报道漩涡的记者，情况有所不同，动机也有差异。有的可能就是设计骗局的参与者；有的则是故意夸大宣传耸人听闻，哗众取宠；更多的人也许是上当受骗，半信半疑，跟着起哄，但即使最后一种人，至少他们的新闻观也是很成问题的。不然，为什么对这种事情如此感到兴趣？报道的态度又如此不够严肃呢？

社会主义的新闻记者，应该是以促进社会进步为己任的。不应该把宝贵的精力和时间，花费在寻觅这类奇特怪异的事情上，近几年来，新闻战线有些同志感到我们报纸的报道内容不够丰富多采，不能够吸引读者，提出了扩大报道面的问题，建议报纸上适

当增加一些知识性、趣味性的稿件，这个建议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们采写稿件，仍然应以促进社会进步为目的，猎取能够对国家人民起到有益作用的题材，既不能单纯为满足某些人的好奇心，更不能迎合某些人的低级情趣。至于那些现代科学还无法作出解释、记者自己也未理解的情况，即使亲眼目睹、深信不疑，如果报道出来可能产生较大副作用的话，也以暂不报道为好。

从杨妹不食的报道，联想起有段时间很多报刊大肆传播的所谓“特异功能”，诸如某个幼儿能用耳朵识字，用手臂识字；某人的眼睛可以看清别人的内脏；最近又有报道说某人能够通过察看人的手掌，不仅可知道这人身体的强弱，有无疾病，过去的遭遇和未来的发展，甚至还能知道这个人的亲戚朋友的上述情况，这种神奇的说法，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了。有人说，记者的责任是如实地反映客观存在的真实情况，既然确有其事，为什么不能报道呢？我想：是否确有其事，姑置不论。如果说，有些现象，因受人们认识水平的局限，目前还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那么，这类现象，可以交给科学家们进行研究，不必向广大人民群众大肆宣扬。否则，由于人民群众科学水平不同，封建迷信思想还残存在很多人的头脑里，对这一部分读者来说，听到这类怪异的情况，确会产生不好的作用，这也是应该注意的。

“退稿状元”的教训

有位长期热心于新闻采访的报社通讯员，工作热情很高，每天东奔西跑，不辞辛苦，一篇篇稿件，源源寄到报社。遗憾的是采用率极低，绝大多数都被编辑打了退票。尽管如此，他却并不灰心，仍然坚持不懈，数年如一。因此周围的同志称他为“退稿状元”。

这位同志百折不挠的精神自然是很可贵了。但报道思想却很值得研究。他写了一些什么样的稿件？为什么都不能利用？他所写的这些稿件，从内容看，倒也不乏具体事实，从文字看，也做到了通顺简洁，只是所报道的情况，如果公诸于世，会起什么作用，却是他在执笔以前没有考虑过的，例如：有条消息，是报道某项科研成果获得成功，而事实上，这个项目是否算是成功了？不仅尚未经过有关部门进行鉴定作出结论，而且还有争议。有篇通讯是报道某工厂在经营管理方面采取了一项新的措施，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从而使该厂的产量有所提高，但是，熟悉经济政策的同志都知道，该厂的一些做法正是国家现行政策所不容许的。因为，从这一家工厂来看，采取这种办法，固然可以收到较好的效果，但如普遍推广，就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其他几篇稿件，也都存在诸如此类的问题。

由此可见，这位同志尽管有很饱满的工作热情，也有较好的文字表达能力，但却忽略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采写一篇新闻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对于采写报道的目的还不明确，那就象是盲人捉麻雀，乱闯乱摸，即使偶然写出一篇可以刊用的稿件，

也只能是侥幸获得命中的。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新闻改革,社会主义的报纸应该怎样办?记者应该怎样选择报道题材,怎样把新闻写得为读者所爱看?这都是改革中正在探讨的问题。但是,有一些不会改变的基本原则,例如:新闻必须真实,新闻报道必须针对当前的实际,要有利于国家各项事业和人民的思想和工作。无论是传递信息、还是报道成绩、表扬先进、介绍经验、以及批评、揭露缺点和错误,都应该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起到有益的作用,或者能够激励人民的斗志,或者能扩大读者的眼界、端正读者的思想认识,以至指导各项工作和群众生活,从而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如果记者离开了这个出发点盲目选择题材,写出的稿件,自然就很难为编辑所选中了。

报道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一种手段,决不能够为报道而报道,更不能为了个人扬名而不顾后果,片面追求稿件利用率,那样做是与“社会活动家”的光荣称号所不相称的。

记者——社会活动家

斯大林在《论工人通讯员》一文中，给新闻记者加上了“社会活动家”的光荣称号。并要求报刊的通讯员也要锻炼出“社会活动家的敏感”。

斯大林所说的社会活动家，当然不指那些东游西逛、东拉西扯、忙忙碌碌的是庸人。而是要有高度的思想觉悟，怀着以革命事业为己任的责任感，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并能发现新事物，新问题，通过分析研究，及时写成稿件，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显然，这种社会活动家，同时也是观察家和研究员。是个包括活动、观察、研究三位一体的社会活动家。

所谓社会活动，首先不在于活动的广度，而在于活动的深度。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发现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事物、新思想、新经验，通过新闻媒介使之发扬光大；同时，也要发掘那些阻碍革命和建设事业向前发展的问題。这样，就要求记者不仅要有高度的思想觉悟，还要有深入实际，能够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锐敏、冷静、客观的观察分析态度，并要熟悉党的各项政策。否则，既不能发现问题，更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举例来说，有人到菜场买菜，遇到营业员，硬要把冷滞商品和热销商品搭配一起出售。如果不仔细思考并作进一步的了解，就会简单地归咎于菜场的经营作风和营业员的服务态度。而作为社会活动家的记者，就不应该这样轻率武断。首先必须弄清菜场工作人员为什么要采取这种硬性搭售的办法？除了怕冷滞商品卖不出去赔钱等等主观原因外，还有没有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这种做法的客观原因？然后顺藤摸

瓜,追根究底,从而就会发现,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长期以来对蔬菜所实行的统购包销的经营方式和从产到销、由批及零的货源分配办法造成的。这套方法不加以改善,硬性搭售的问题就难根本解决。又如,有人发现自己的孩子课外作业很重,甚至影响了必要的休息和睡眠,就责怪学校的个别教师对学生要求过苛。而作为社会活动家的记者,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思路就要开阔一些。必须弄清这种现象只是个别学校存在,还是普遍存在?是纯属教师主观方面的问题,还是与当前的某种社会倾向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连?显然,要做到这一点,没有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是不行的。如果记者只是浮光掠影地到处乱跑,就很难抓住切中时弊的要害问题,更不能提出客观中肯的批评意见或切实可行的建议。

当然,一个专门从事采访活动的记者,在坚持深入采访的前提下,活动的天地也应该力求广阔,力求了解更多方面的情况。这不仅是报道任务的需要,而且,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可以从现实生活中吸取营养,丰富生活知识,锻炼观察分析能力。客观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广度和深度是对立的统一体,没有一定的广度,也不可能达到相当的深度。

发现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肩负报道任务的新闻记者,一旦发现了阻碍社会前进的问题,就要通过报道来促进矛盾的解决或缓和。这是记者的职业所赋予的使命,是义不容辞的。可是回顾多年来在许多情况下,记者发现了一些问题,有时却缄口不言,这样,记者为发现问题所作的一切努力,就完全失去了实际意义。在这方面我们是有着沉痛教训的。例如,五十年代后期,在“大跃进”的日子里,社会上刮起的浮夸风、共产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给生产和人们生活带来种种困难,对不少从事新闻工作的同志来说,并非毫无发现,甚至有的同志也作过一些调查研究,有着比较清

醒的认识。但在那种乱打棍子、乱扣帽子的紧张气氛中,却不敢实事求是地讲出真实情况。至于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更是大家有目共睹,心有同感的,只是敢怒而不敢言罢了。“四人帮”被打倒以后,党的优良传统逐渐恢复,民主空气得以发扬,但是,长期以来的习惯势力在少数同志的头脑里根深蒂固,利用报纸开展批评、提出一些问题,在某些情况下仍然会遇到阻力。这又要求记者必须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否则,社会活动不能收到社会效果,是不能成其为社会活动家的。

有些事情由于涉及到某些部门的具体工作,往往会和这些部门产生不同的看法,遇到这种情况,记者应该独立思考,坚持党的政策原则。但是,也要虚心听取并认真研究别人的意见,开展同志式的商榷、探讨,防止固执个人偏见。至于要否公诸报端,必须遵循党的组织原则。无产阶级的社会活动家,也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也要受到党的纪律的约束,不能成为资产阶级的“无冕之王”。

社会活动家的“显微镜”

有人说：“衣食住行非小事，喜怒哀乐皆文章。”记者要善于从人们生活琐事中发掘出重要的报道题材。这话对不对呢？当然，也还要作具体分析。如果仅仅是个别人生活中遇到的偶然现象，自然不必小题大作。反之，是个涉及面较广的普遍性问题，则确有文章可做的。

举例来说，有一次，我看到一封读者来信，说他的手表坏了，拿到表店修理，因无配件，表店不肯接修。就这件事而论，首先就要弄清，是个别表店因无配件不肯接修呢，还是所有的表店都没有配件而不能接修？这只手表是只什么样的手表？是解放前进口的老型号外国表，还是解放后生产的国产表？不弄清这些情况，就无法判断事情的轻重大小。对于上述几点，这封来信中已交代清楚了，说是“一九七〇年购买的上海牌手表，几乎跑遍了全市各大表店，都因没有配件而不肯接修。”显然这就不是个别现象了。后来经过进一步了解，得知上海手表厂于五十年代末期建成投产以来，到七十年代初期，先后生产了531型、SS1型、SS1K型三种型号的手表，这三种表目前均已不再生产。于是，这些表的零配件也就随之绝迹。但是多年来，这三种表投入市场的数量是很大的，总共有两千四百多万只，它们的使用寿命远远没有结束，一旦有所损坏，全部无法修理，这对国家、对人民都是很大的浪费。举一反三，推而广之，从钢笔、照相机、收音机，到生产所用的各种机床、锅炉等，如果改变了型号，配件也就马上停产，那么，所造成的浪费，岂不更加严重？由此可见，这是一个很值得提出的大问题。

这还仅仅是就造成的后果而言。至于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生产安排上的困难，还是工作中的疏忽，抑或是经营思想上嫌产值小、利润微而不愿生产？如进一步地追根究底，就更有文章可作。回顾建国以来，象这类的事情出现过不少，造成的原因各有不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上海市场一度买不到铁皮锁，什么原因呢？原来在经济改造改组的过程中，曾把全市生产铁皮锁的小作坊，并成了一家工厂，此后又让这家工厂转产了其他产品。而上海生产的铁皮锁一向是供应全国各地的，这样一来，不仅上海市场买不到铁皮锁，许多兄弟省市也纷纷脱销。又如“大跃进”的后期，尽管钢铁的产量猛增了多少倍，但以钢铁为原料的缝衣针，剃胡子的刀片，做饭用的刀、铲、铁锅等，供应都十分紧张。主要因为在“一切要为钢帅让路”的口号下，许多日用小商品在生产领域中，被挤掉了。这都反映了贯彻经济政策和经济工作中的失误。

物质生活是这样，精神生活同样也是这样。人们的思想情绪有时也与党的政策、工作有关，同样也可以追溯出值得重视的问题。

斯大林要求记者应该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我想，社会活动家和一般群众所不同者，主要就是对待事物的观察力和责任感。对所见所闻，不是孤立地、就事论事地进行观察，而是善于和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并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进行思考。说得形象一点，可以说是他有一只一般人所没有的“显微镜”，习惯于把一些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锁事，放在这只“显微镜”下，观察其内在的活动因素和对整个国家机体的影响，从而作出正确的判断。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政治敏感。